



## “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将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行

本报讯 5月31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浙江下沙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协办的“珠还合浦,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将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二展厅正式开展,6月1日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时隔近三年,国家图书馆再次推出《永乐大典》主题展览,旨在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图老专家回信精神,精选包括善本、舆图、手稿等在内的馆藏精品,系统讲述《永乐大典》的编纂经过、版式外观、聚散流变、辑佚影印,着重突出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其“明珠还于合浦”的历程及国家图书馆对《永乐大典》的修复、保护、整理与利用。同时,成立《永乐大典》研究中心,以《永乐大典》学术研究、学界服务、宣传推广为核心,持续推进古籍保护事业发展和中华传统典籍文化传播。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国家图书馆善本中的“四大宝藏”之一。这部旷世宏编编辑宏富,朱墨灿然,温润古雅,具有版式精美、开本宏大、绘图绚丽等特点,是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精华之作。它有着离散飘零的命运,以及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的历史,折射着近代以来中华古籍保护事业的缩影,更是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文脉永存的有力见证。《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原11095册22937卷(包含目录、凡例60卷)的嘉靖副本,截至目前仅有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永乐大典》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湾),是《永乐大典》海内外最大藏家。2018年,国家图书馆举办“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与好评。

5个单元讲述《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突出回归和再造的艰辛历程

本次展览共分为“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士林”5个单元,通过讲述这部巨著的前世今生,全面展示《永乐大典》蕴含的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展览特设单元展示《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以图表加重点事件描述的形式,细致全面地整理了《永乐大典》通过政府拨交、海外送还、藏家捐赠、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历程,深度挖掘了国家图书馆在不同时期围绕大典进行的部署安排,展现了一代代图书馆人前赴后继、呕心沥血地对《永乐大典》进行的搜集、保护、修复、出版工作;同时,回顾了抗战时期《永乐大

典》等古籍善本南迁、运美往事,梳理海外《永乐大典》的回归历程,帮助观众了解《永乐大典》在旧中国飘摇多舛的命运,以及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社会各界人士为将其传承后世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

展览共展出展品60余种70余册(件),其中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即“人”字册,“陈”字册,“农”字册,“易”字册,“颂、溶、蓉、庸”字册,“郎”字册,2件“水”字册,“士”字册。有多册是海外回归的代表性《永乐大典》,如1938年王重民自英国为北平图书馆购入的“农”字册,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送还中国的“颂、溶、蓉、庸”字册,1955年德国政府送还中国的“士”字册等。

此外,还有1950年顾子刚捐赠的“易”字册,1951年徐伯郊捐赠的“郎”字册,1951年商务印书馆捐赠的“水”字册,1958年北京大学捐赠的“水”字册等,充分体现了国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华典籍的重视、爱护之心,这些慷慨无私的捐赠如涓涓细流汇入国家图书馆,也让珍贵古籍惠及更多社会公众。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展览将选择历代具有代表性的类书进行介绍,专门对“类书”这种传统书籍类型进行科普。

《永乐大典》“合古今而集大成”,诸多佚文秘笈、典章制度赖其得以流传后世。自明中期至今,历代学者从中辑佚的步伐从未停止,展览将以封面集合的形式向观众展示《旧五代史》《直斋书录解题》《宋会要辑稿》等部分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的书籍。

除《永乐大典》外,展览还配合展出明抄本、明刻本、明拓本等40余册(件)古籍精品;此外,将展示国家图书馆在不同时期入藏《永乐大典》的相关档案复制件,让观众全面了解《永乐大典》及其传承历史。

多种互动体验,感受中华典籍的永恒魅力

为了让展览更具体验感、参与性,本次展览加大新媒体手段的应用力度,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国之瑰宝的独特魅力。展厅入口处设有沉浸式环幕体验区,创造虚实结合、层次分明的沉浸式体验。“名家带你临大典”触屏游戏和永乐版式透明屏互动游戏,能让观众体验台阁体书法,学习古籍版式知识。笔墨纸砚互动游戏和《永乐大典》知识互动游戏,则是通过问答互动的方式,让观众感受《永

大典》的纸张之良和用墨之精,学习其中蕴含的中医养生、书法、动植物等知识。

此外,展厅触摸屏提供《永乐大典》回归图表和《永乐大典》数据库供大家查阅。《永乐大典》数据库利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高清仿真影印的成果,首次集中发布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多家收藏机构所藏《永乐大典》的高清彩色图像,辅以图文对照、版式还原、全文数字检索等功能。

为了配合展览,国家典籍博物馆还策划了4种研学课程及1个主题活动,内容涉及《永乐大典》的编修始末、内容体例、史实故事、回归辑佚等,借助永乐抄经、图画鉴赏、版式制作、诗文吟诵等互动体验,用多种形式展开《永乐大典》这幅历史画卷,让观众多层次、多角度地感受中华典籍与文明的厚重。

成立《永乐大典》研究中心,续写前辈们的典籍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给国图八位老专家回信时,也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明确指示。今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古籍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今后各项工作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为全面推进《永乐大典》保护和研究,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国家图书馆将正式在古籍馆加挂“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研究中心”牌子,旨在联系团结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进一步通过组织学术会议、为学界提供服务、建设永乐大典资源库等开展深入研究;通过举办展览、开发文创、利用多媒体宣传推广等各方面工作,不断推出更多新的成果。研究中心拟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陈力,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编审张忱石等在《永乐大典》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专家学者为特聘专家。下一步,希望在众多学者和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下,能够对《永乐大典》的编纂成书、散佚收藏、修复保护、影印出版等进行更全面的研究、更深入的资料挖掘和更充分的数字呈现,让其中蕴含的文化传播更广,以期取得更丰富的成果,续写前辈们的典籍故事,让《永乐大典》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白玉静

##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第23期

02 特别关注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正式出版

03 特别关注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建院三周年恳谈会

04 业界动态

“十四五”规划纲要描绘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蓝图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举办本年度首期古籍装帧与保护培训班

05 书里书外

《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整理综述

06 理论园地

缩微技术在抗战文献抢救保护中的应用

07 图书推荐

《(民国)浙江续通志稿》正式推出

《徐悲鸿全集》首次全面展现一代巨匠艺术世界

08 历史钩沉

梅冷生先生抗战时期抢救温州重要典籍事例

## 本报顾问

谭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饶权(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  
彭斐章(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武汉大学资深教授)  
吴慰慈(中国图书馆学会顾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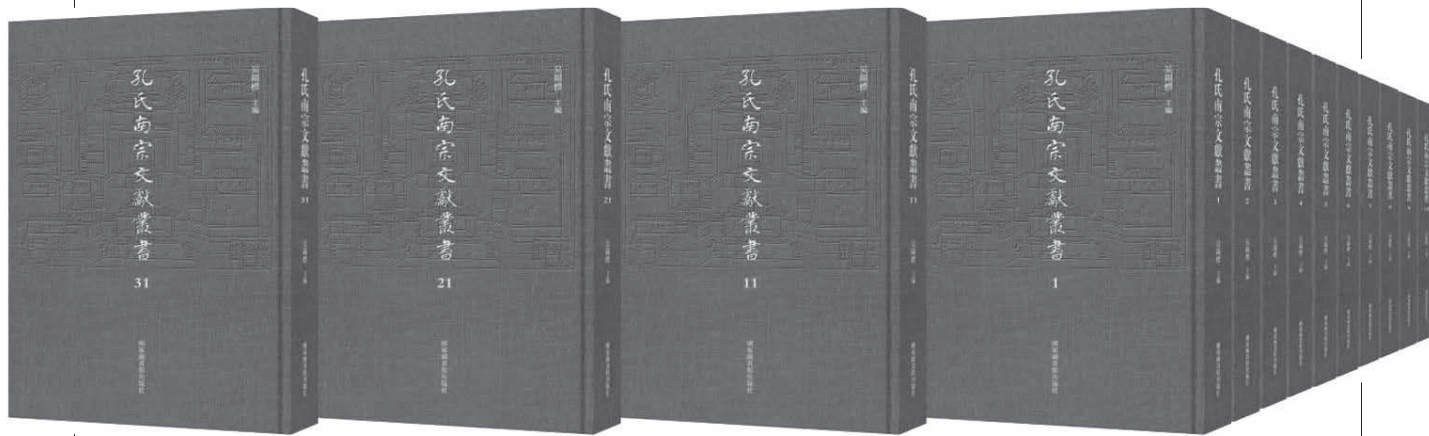
本报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名)

王波(《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王明舟(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王媛(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秘书长)  
白雪华(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刘小琴(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刘兹恒(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刘惠平(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  
任竞(重庆图书馆馆长)  
孙月沐(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  
朱强(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馆长)  
刘宇松(贵州省图书馆原馆长)  
汤更生(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秘书长)  
肖维平(首都图书馆党委书记)  
何光伦(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初景利(《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社长、主编)  
吴晔(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张久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书记、主任)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李东来(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东莞图书馆馆长)  
李学谦(中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联盟主席)  
李国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李勇(河北省图书馆馆长)  
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杨建忠(化学工业出版社副社长)  
杨沛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研究员)  
邱冠华(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陈超(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  
陈锐(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陈传夫(武汉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陈胜利(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  
陈源蒸(中宣部原出版局研究员)  
周云岳(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宗俊峰(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  
林鹏(科学出版社总经理)  
林旭东(安徽省图书馆馆长)  
范并思(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系教授)  
郑智明(福建省图书馆馆长)  
倪晓建(首都图书馆原馆长)  
柯平(南开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赵俊玲(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贾庆鹏(青岛出版集团总经理)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徐雁(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徐俊(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索传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郭斌(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中小型公共图书馆联合会主任)  
顾森(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主任)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程焕文(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褚树青(浙江图书馆馆长)  
蔡继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  
霍瑞娟(国家图书馆办公室主任)  
魏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本报投稿邮箱  
tushuguanbao@126.com

本报虚假失实报道举报电话  
010-88361919  
转载本报文章  
请与本报联系并注明出处

## 构筑孔氏南宗研究新高地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正式出版



**本报讯** 5月20日,《孔氏南宗文献丛书》新书发布暨南孔文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该会议由中共衢州市委宣传部、衢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衢州学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衢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刘章华致辞,本书主编、衢州学院吴锡标教授介绍了图书整理情况,本书责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大项目编辑室张慧霞介绍图书出版情况。衢州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周兆忠主持新书发布会,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范立舟教授主持研讨会。

魏崇在致辞中表示,孔子世家是全国罕见的“文献故家”,其著述延续时间极长,涉及范围极广,内涵极其丰富。孔氏南宗著述则是孔子世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图出版社高度重视《孔氏南宗文献丛书》项目,组织了优秀的编辑团队,从完善选目、底本组织、拍照修图、提要审核、装帧设计、印制等细节入手,把握进度和质量,经过编辑室的不懈努力,圆满完成了出版任务。《孔氏南宗文献丛书》《衢州文献集成》将成为国图出版社在传统文化整理和地方文献整理方面新的代表性成果。

刘章华在讲话中指出,衢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圣人孔子后裔的世居地和第二故乡,素有“东南阙里、南孔圣地”的美誉。多年来,衢州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的嘱托,深入实施“南孔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今天,由衢州学院南孔文化研究中心五年磨一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孔氏南宗文献丛书》便是其中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既是南孔文化学术研究的一座高峰,又为进一步开展南孔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完备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学术价值。衷心希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能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衢州的

学术研究,未来双方能够开展更多的交流合作。

由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编纂的《孔氏南宗文献丛书》共48册,收录孔氏南宗族人的著述41种,记载孔氏南宗的著述2种。《孔氏南宗文献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继明代衢州知府沈杰整理汇编《三衢孔氏家庙志》之后,对孔氏南宗文献所进行的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出版。

学者认为,“这一工程对孔氏南宗文献的汇集、保存与传播有当代之利,更有后世之功”。

南宋初年,孔子第48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部分族人扈跸南渡,寓居浙江衢州,重建宗庙。在此后的近900年历史中,孔子后裔在南方广大地区衍生出众多支派,逐渐形成了以衢州孔氏家庙为核心、支派遍布江南地区、由孔子后裔组成的特殊宗族——孔氏南宗。孔氏南宗在孔氏宗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明代胡翰、清代魏禧等著名学者均以为之“孔氏大宗”。孔氏南宗族人在政治、教育、文化诸方面对当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两次视察衢州期间,分别作出“南孔文化关键要扩大宣传,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要“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的重要指示。长期以来,衢州学院积极践行习近平同志的嘱托,扎实推进孔氏南宗研究,不断彰显学术特色。

孔子世家著述延续时间极长,涉及范围极广,内涵极其丰富,是全国罕见的“文献故家”。孔氏南宗著述是孔子世家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孔氏南宗继孔子之德教,以诗书传家,自南宋初年以来至民国时期的820年间,代有著述,文献丰富。根据现有史料考证,孔氏南宗有著述者见于记载的有50多人,著述类文献见于著录者逾100种(不包括宗谱、族谱、家谱、家乘、祠谱、

渊源录等文献),兼涉经、史、子、集诸部,由此可见孔氏南宗家族之大、脉络之广、文献之富。

然而,由于形成于特殊历史时期,且长期处于平民地位,加之支派众多而分布广泛,孔氏南宗文献散佚情况相当严重,可谓二不存一,至今存世者仅40多种。同时,现存资料又极其分散,从而严重制约了孔氏南宗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鉴于此,衢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从2016年开始,对孔氏南宗文献进行了系统搜集与整理汇编。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孔氏南宗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编纂出版,一方面具有抢救性保存古籍的作用,一方面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用,不仅厘清了孔氏南宗内在的发展脉络和机制,将推动孔氏南宗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对江南学术的梳理、浙学的研究、宗族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且将为之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构筑了孔氏南宗研究的新高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黄灵庚,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教授舒大刚,山东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程奇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踪训国,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诸凤娟,曲阜师范大学暨孔府档案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吴佩林,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庄建等学者,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李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罗琳,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冯立昇,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史梅,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惠新楼,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刘乃英,山东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周洪才,绍兴市图书馆副馆长李弘,郴州市文史研究会会长雷晓达,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典藏部业务主管赵彦梅等专家共计40余人参加会议。

白玉静

#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建院三周年恳谈会

**本报讯** 5月10日,以“夯实基础,丰富内涵”为主题的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建院三周年恳谈会在校图书馆信息中心举行。

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高玉葆出席会议并致辞。天津师范大学校长、古籍保护研究院综合管理委员会主任钟英华发表讲话。著名版本学家、哈佛燕京图书馆前善本室主任沈津先生作为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导师代表作视频发言,他深情回顾了建院前后与古保院的点点滴滴,表达了对古保院办出特色和品牌的祝福。

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教授做了研究院建院三年工作报告;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振良介绍了《古籍保护研究》的编纂情况;古籍保护研究院副教授周余姣介绍了天津师范大学校史研究的进展;古籍保护研究院教

师凌一鸣针对拟建立的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编目研修基地的情况做了报告。

合作支持院系代表天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效雷、天师大管理学院院长刘冰,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天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国庆先后发言。他们对天津师大古籍保护研究院建院三年来取得的成绩予以高度评价。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黎冬瑶、2019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论文古籍修复与出版方向研究生武文杰分别作为毕业生代表和在校生代表发言,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古保院学习期间的体会,引发共鸣。天津教育出版社编审强华,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员胡艳杰,天师大期刊中心主任高琳琦,天师大学报常务副主编、天师大图书馆副馆长、古籍保护研究院副院长耿华,天师大图书馆副馆长回增玉、柴鹏程,天师大古

保院副院长李华伟,天师大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张瑶,天师大人事处李理,天师大古保院全体专任教师与实训课指导教师,天师大2019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论文古籍修复与出版方向研究生,2020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论文古籍保护与传播方向研究生,以及天师大图书馆45岁以下青年馆员参加了会议。

三年来,天师大古保院在学科带头人姚伯岳教授的带领下,在各界的多方关心和支持下,走过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师资队伍日益壮大,力量渐趋雄厚;教学方式丰富多样,人才培养成果显著;科研项目屡有斩获,学术活动蓬勃开展;积极投入社会服务,不断扩大业界影响;精心办刊,《古籍保护研究》获得突破性进展。在响应社会各界期待与国家重大关切的赶考中,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白玉静



## 不忘初心,再接再厉, 全面开创古籍保护新局面

□高玉葆(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

年年岁岁花相似,不知不觉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特殊日子——我们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院庆日。不同的是,她从2岁变成了3岁,从一棵小树开始更快地生长,在纵深与横向上都显现出昂扬的姿态。3年前,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挂牌成立,我兼任了研究院的院长,直到今天,这依然是我唯一的兼职,以后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愿意一直在这个岗位上为大家服务。

古籍保护是党和国家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的高度而进行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是我国长期坚持的重大国策。如今,“保护古籍,传承文明”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应该说,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古籍保护事业发展的初心与使命让我们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心心相印。

天津师大历来重视古籍保护,2018年5月,我们在原天津师大古籍保护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天津师大古籍保护研究院,其初衷即是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来加强古籍保护事业;从学校各部门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出发,进行古籍保护学科体系规划;从建设校园文化创新体系角度,重视古籍保护人才的培养工作。因此,我们研究院的每一位同志,无论是理论课教师、实践课教师,还是校外导师,以及校图书馆与相关院系部门的支持力量,都是古籍保护工作者,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实践指导、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承担着重要责任。

我欣喜地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同仁兢兢业业、不负使命,又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疫情期间,古保院教师与全校教师一道,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坚持教学,同时积极参加对外学术交流,这种敬业精神难能可贵。2019级、2020级古籍保护方向的专业学位论文得到了更高水平和更为全面的专业训练;2020届毕业生的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除1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外,大多数均走上了古籍保护相关工作岗位,成为朝



气蓬勃、素质过硬的新生力量。国内一些古籍收藏单位现在甚至指名“预订”我们研究院的毕业生,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已逐渐发展成为业界的一个知名品牌,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好评,这从今年我校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研究生第一志愿考生报考数量激增上也再次得到有力证明。所有这些,都是对我们古保院成绩的充分诠释。

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古保院已逐渐发展为我国北方的古籍保护教学和科研重镇,并且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的古籍保护工作团队和而不同,保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俨然已呈三足鼎立之态,这是令人欣喜的局面。

我刚刚得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古籍编目研修基地即将花落我院,这又是一个好消息!我相信,假以时日,天津师大古籍保护研究院一定会更加壮大,她不仅会拥有国内一流的教学和科研团队,在古籍保护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且一定会走向世界,配合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我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凡是过往皆是序章,所有将来皆为可盼。今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高层次复合型古籍保护人才需要培养,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任重道远,也需要加快推进。美好的未来需要通过我们的并肩奋斗来创造,我们对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前景充满希望,也充满信心。

## 风正帆悬正当时,群策群力再出发

□钟英华(天津师范大学校长、古籍保护研究院综合管理委员会主任)

5月的天津春意褪去,绿荫满眼,令人神清气爽。今天,在我们天津师大这座全国文明校园里,我们的古籍保护研究院召开3周年院庆恳谈会,我觉得也是在探讨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中华文明之光更好地闪耀。

3年前,我们天津师范大学成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开始在古籍保护方面谋篇布局,持续发力。可以说,3年来,我亲眼见证了古保院的每一步成长,看着她从一棵幼苗,发展到如今的初步长成。由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建立,我校古籍保护方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有了可靠的师资保证,开设了一系列符合培养方向的优质专业课程,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兼具古籍保护理论功底与实操技能的毕业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研究院老师们的勤奋、努力,可谓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姚伯岳先生入职时间最长,迄今也才3年有余,而最短期入职还不到1年。但他们底蕴深厚、加速度快,爆发力惊人,不仅发表、出版了质优量多的学术论文或专著,而且几乎每个人都争取到了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甚至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放眼全国,这在同类院系中也是不多见的。我们研究院的老师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活动,其形成的良好声誉与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吸引着国内外同行不断专程前来参访,就连其他界别的机构与朋友也不时慕名而来进行切磋交流。古籍保护研究院更是与校图书馆特藏部一起,成为本校接待贵宾优先选择的参观场所。报纸、电台、电视台与新媒体对古保院也多方报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知道了我们天津师范大学在古籍保护方面付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与本校其他院系相比,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历史很短,但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各方的



共同努力下,她已经成为了我们天津师范大学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过去的一年里,无论是2020年岁首召开的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开题论证会,还是年末举办的“《古籍保护研究》集刊发展研讨会”,都充分凸显了我校在古籍保护方面的厚重实力。前两年,我院两位老师分别到美国东西两所著名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做访问学者,帮助他们整理馆藏中国古籍,受到国外汉学界的重视和好评。我们的古保院,在学科带头人姚伯岳教授的带领下,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的古籍保护工作团队一直保持密切的互动交流,并且受邀共同筹备、承办拟于今年10月举办的首届“古籍保护学院联盟论坛”,这本身就代表着社会对我校的充分认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用3年时间走过了其他两家6年甚至更长时间走过的路。对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又充满新的期待!

在国家的“十四五”规划中,古籍保护持续受到重点关注;天津师大校方也将继续不遗余力地加大对古籍保护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我们古保院不断壮大的年轻团队可以放心无忧继续驰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我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古籍保护研究院会给学校带来源源不断的新的惊喜!

## “十四五”规划纲要描绘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蓝图

**本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系统部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大工程项目。相较以往的五年规划,文物工作相关内容篇幅明显增加、权重更为凸显,文物科技创新、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首次写入。未来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然勾画。

**系统谋划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纲要第三十四章“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设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节;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物科技创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工程,开展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推进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保护,完善流失文物

追索返还制度。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加强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统筹推动文物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纲要其他篇章中,多处涉及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第七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第二十四章“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出,保护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乡村风貌。第八篇“完善新型城镇化

战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第二十九章“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提出,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杜绝大拆大建,让城市留下记忆、让居民记住乡愁。第九篇“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第三十一章“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提出,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工程。

**前瞻部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大工程项目:**纲要共设置20个专栏。专栏13“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工程”包含“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中华典籍整理出版”等内容,明确提出加强安阳殷墟、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和重要石窟寺等遗址保护,开展江西汉代海昏侯国、河南仰韶村、良渚古城、石峁、陶寺、三星堆、曲阜鲁国故城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建设20个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等;组织《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等重点古籍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实施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分类采集梳理文化遗产数据,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  
举办本年度首期古籍装帧与保护培训班

**本报讯** 4月24日至29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鉴定专业委员会联合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在国家图书馆举办古籍装帧与保护培训班。这是协会本年度首期面向社会大众的培训活动。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17个省市区图书馆、档案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单位的31名学员经过遴选,获准参加培训。

“装帧”一词,指对图书开本、版式、封面、字体、扉页、插图、装订形式等所进行的技术与艺术处理。中国代书籍装帧形制的形成与演变,同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法、便于检阅、利于保护等诸方面紧密相关。作为古籍版本鉴定与辨伪

的重要途径,装帧历来是古籍保护的重要内容。

本次培训班响应社会公众在古籍装帧与保护这个细分领域的需求,邀请到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致忠、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杜伟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和国家图书馆修复专家刘建明、朱振彬、胡泊、田婷婷等8人为学员授课。课程涵盖古籍装帧漫谈、清宫书籍装帧、古籍装帧与古籍保护、卷轴装的装修技法、蝴蝶装的装修技法等内容,理论与实践并重,力求让学员在深入学习古籍装帧知识的同时,快速了解并掌握

若干种古籍装帧形式,从而能学以致用,在本职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发挥专家资源优势,面向社会开展古籍保护专题培训,推动人才队伍建设,是协会作为古籍保护行业组织的初心和使命。自2018年以来,协会依托专业委员会,联合会员单位开展印谱文献编目鉴定、民间古籍收藏与保护、古籍拓拓技艺、古籍书志、西文书籍装帧与修复、古籍收藏鉴赏阅读等多次培训活动,累计培训古籍保护从业人员和爱好者500余人次,以点带面,有力促进了古籍保护相关领域好做法、好经验的传承传播和应用推广。

## 图片报道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月14日,烟台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人员走进烟台市芝罘区潇翔小学,与该校师生进行了一场“中华古籍进校园”古籍拓印培训体验活动。此次活动也是烟台图书馆“走近中华古籍”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闻速读

## 耒阳市博物馆获赠珍贵革命历史文献

**本报讯** 近日,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收藏爱好者向耒阳市博物馆捐赠一批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这批资料包含《耒阳人民革命斗争史》一书,该书是1959年3月由耒阳革命史编委会编,约为目前耒阳地区现存的记录耒阳革命斗争历史最早的资料,详细介绍了从“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期间耒阳长达30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为耒阳的党史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实物佐证。

## “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古籍展在安阳举行

**本报讯** “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古籍展不久前在安阳市中国文字博物馆开展。94部珍贵古籍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本次展览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中国文字博物馆共同主办,将持续到6月26日。展览以我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主线,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七大板块,共展出94部河南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

## 长沙县六旬老人向农家书屋捐赠69册中医古籍

**本报讯** 近日,在长沙县黄兴镇高塘村农家书屋,66岁的李洪罗老人小心翼翼地捧着69册中医古籍,交予现场工作人员。这些古籍中,既有对中医的辩证、诊断、方剂、药物等分门别类进行的系统论述,又有对内外科、儿科、妇科等疑难杂症及治疗方法的详细解说,对研究中医有重要价值与意义。李洪罗老人一直做收购废品的生意,无意中发展这些积满尘埃的古籍,第一时间想到捐赠给村上的农家书屋。他表示,中医是国家瑰宝,希望这些古籍对中医有研究价值。

## 文物研究员张守中向石家庄市图书馆捐书三百余册

**本报讯** 5月7日,一位老者从石家庄市图书馆馆长于少华手中接过入藏证书,一场图书捐赠仪式落下帷幕。

这位老者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古文字工具书编撰专家张守中先生。此次捐赠的书籍共计271种354册,品种多、数量大、价值高。其中,《己庚集》《真鉴集》《方北

集》《书画旧藏记》等为张老自著。此外还有《石家庄元氏、鹿泉墓葬发掘报告》《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等书籍,具有极高的考古文博与地方文献价值;而《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望山楚简文字编》《侯马盟书字表(试行版)》等工具

书,也为热爱书法篆刻的读者提供了更加权威系统的参考支撑。

张守中先生从事古文字工作数十年,编撰了《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包山楚简文字编》《郭店楚简文字编》三部古文字工具书。此次向图书馆赠书,是他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生动注解。

##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出版

**本报讯** 《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一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萧易跟随《中国国家地理》进行考古之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集结19篇文章,汇成《寻蜀记》。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呈现并解读出汉代的石阙、唐代

的石阙、宋代的古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这些文物串连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

萧易,《天府广记》杂志主编,《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专栏撰稿人。曾出版《古蜀国旁白》《唤醒纵目神》《纵目神时代》《金沙》《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专著。

江水



# 《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整理综述

□姚文杰 孔煜华 赵文杰(中国书店出版社)

大兴作为历史名城北京的一部分,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遗产,这些都在地方志书中得以保存。历代编纂的北京地区志书中有不少关于大兴的内容,清康熙年间还编纂了《大兴县志》,有刻本和抄本流传。2019年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以《大兴县志》的清代抄本为底本,经过与全国各地所藏的《大兴县志》刻本及抄本梳理对比,选定以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刻本作为主要参校本进行校勘,以校勘记形式记录其差异之处,将校勘记以红色文字套印在每页的天头处。这部《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以宣纸线装原大影印保存版本原貌,天头处附校勘文字,体现古籍整理之价值,为北京史研究、北京地方志研究以及地方志资料文献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和研究整理思路。

大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古蓟县,随着朝代的更迭,其名称和区域划分也有过多次变更。随着北京在全国城市中地位愈加突出,大兴也逐渐为人所重视。“大兴”一名始自金代,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迁都中都(燕京),改永安析津府为大兴府,下辖有大兴、宛平、安次等县。元太祖十年(1215)设燕京路,总管大兴府。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仍旧。至元九年(1272)改中都为大都,大兴县为其附郭。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迁都北平,将北平府更名为顺天府,以大兴县和宛平县为附郭。自此一直到清末,大兴和宛平一直作为北京城的附郭,以中轴线为界,东侧为大兴县,西侧为宛平县。大兴的历史变迁及其山川河渠、物产矿冶、关隘交通、城池宫殿、名胜古迹、衙署坛设、食货田亩、祀典庙宇以及名宦职官、选举乡贤、艺文图籍等等,都依赖于地方志书得以保存。

## 《[康熙]大兴县志》 编纂、刊印及流布概况

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志书的编纂工作。据史籍记载,北京地区也有不少志书,但令人惋惜的是,早期编纂的志书大部分都已散佚。现存北京地区最早的志书是元代熊梦得编纂的《析津志》,为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明成祖迁都后,更加重视北京地区志书的编纂工作,曾诏令各地编修方志和《大明一统志》。于是,顺天府及其附郭大兴县、宛平县开始着手编修《顺天府志》和《大兴县志》《宛平县志》。这些志书后来都散佚了,但是《永乐大典》保留了其内容,被后人辑录出来,编为《[永乐]顺天府志》。万历二十一年(1593),顺天府尹谢杰等人编纂了《[万历]顺天府志》,这是现存明代最完整的北京地区府志。

到了清代,康熙十一年(1672)大学士卫周祚奏请:“各省《通志》尚多阙略,宜仿儒臣修纂。举天下地理、形势、户口、田赋、风俗、人才灿然具列汇为《一统志》,以备御览。”康熙皇帝“诏允其请”,令天下郡县皆修志书。作为全国“首邑”的顺天府自然更为重视对本地志书的编修,并要求其所辖各县尤其是附郭大兴和宛平,提供相关资料。在此背景之下,《大兴县志》的编纂工作也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式开始,由当时的知县张茂节主持,李开泰等人执笔。张茂节,字蔚宗,江苏沐阳人,拔贡生。康熙十二年(1673)出任大兴知县,十四年(1675)离职。康熙十九年(1680)再次出任大兴知县。李开泰,字子如,大兴士绅,康熙五年(1666)顺天府乡试解元。《大兴县志》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完成初稿,经张茂节修改、厘正之后,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二月雕版刊行。

乾隆三年(1738),对康熙年间编纂的《大兴县志》加以修订增补,如第二卷增加了满学教授洪德元的《特设满洲儒学碑记》,末尾新增了梅穀成的《重修顺天府义学记》等,并在原雕版基础上进行增补,再

次刊行。全国一些图书馆等机构都收藏有《[康熙]大兴县志》刻本。

除刻本外,《[康熙]大兴县志》还有一些抄本,其中不少亦可见于著录或被图书馆等机构收藏。

2018年,北京市大兴区史志办公室在进行文献整理时,发现了一部《[康熙]大兴县志》抄本。经研究发现,此《[康熙]大兴县志》抄本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兴文史办从中国书店购得。据当事人回忆,该抄本为中国书店雷梦水先生提供,明确标注为清代抄本。该抄本用统一刷印的双栏线专用纸,由多人分别抄录而成。每半页9行,每行大致19个字。凡遇有“皇上”高抬两格,遇有“圣”“都”“国”上抬一格。书口统一雕有“大兴县志”字样。末尾有乾隆三年(1738)增补的《重修顺天府义学记》一文,据此推测,该抄本应是依照乾隆年间的续刻本抄录。

## 清抄本《大兴县志》的 整理校勘过程

《[康熙]大兴县志》虽有康熙年间的刻本和乾隆年间的续刻增补本,但是依据目前可知文献资料,刻本《大兴县志》流传不广,且留存至今的刻本大多存在漫漶不清、页面脱漏之现象,而大兴区史志办公室发现的抄本内容较为完整,页面清晰,字迹清秀俊朗,在《大兴县志》已知的抄本中难得一见,可以弥补刻本之不足。因此我们决定选择保存相对完好的其他藏本与之进行校勘对比,通过校勘记的形式记录此抄本与其他藏本之差异,以供研究者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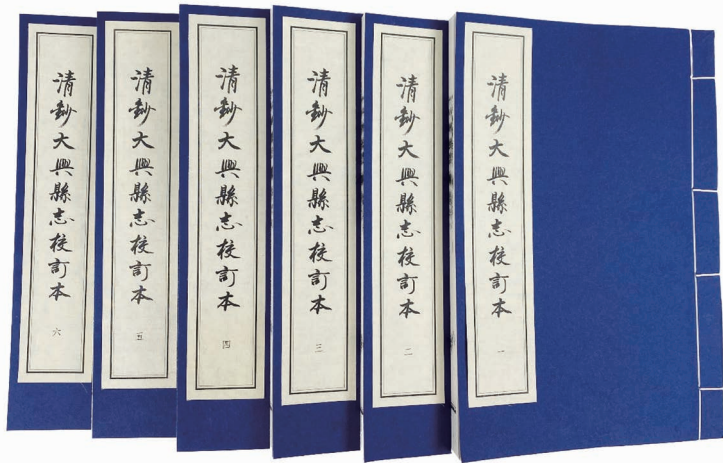
### 1. 梳理各地所藏的刻本和抄本

整理工作开始之初,我们对《大兴县志》在各地的藏本进行了详尽核查和初步对比,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列举如下:

首都图书馆藏刻本。著录为刻本,一函四册,半页9行,每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半框21.2厘米×15厘米,有崔麟台题跋,铃朱文“崔麟台印”,书中有大量抄配。实际上该藏本序的部分为半面8行,每行16字左右,字号比正文稍大;正文部分半面9行,每行20字。经统计,抄配部分占全书的75%,刻本部分只占25%,已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刻本。

国家图书馆藏刻本。序的部分半页8行,每行16字,正文部分半页9行,每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有“京师图书馆藏书记”印,正文第一卷第八页缺,末尾有乾隆三年(1738)的《重修顺天府义学记》。

南京图书馆藏刻本。版式与国家图书馆藏刻本大致相同,但有细微差异,且文字清晰度高于国家图书馆藏刻本。图略部分在开篇,凡例末尾多出一页,前半页有两段文字,可与上一页内容接续,末尾有落款“郝尚礼、徐兆斗等识”,后半页为《修志姓氏》。正文第一卷第八页存,第二卷中无《特设满洲儒学碑记》(其他已见刻本均有此文),末尾无《重修顺天府义学记》。序的第



一页右下方有“臣金绍伦”印,第二卷第二页上第六行有手写的“伦案……”双行小字的案语。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刻本。版式基本与国家图书馆藏刻本相同,文字略有差异,凡例排在目录之前,正文第一卷第八页缺,末尾无《重修顺天府义学记》。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题名为“河北大兴县志”,一函八册,半页9行,每行约15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有“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资料系 昭15.6.24”印(“昭15.6.24”推测为时间,即1940年6月24日),无《帝京图略》部分,正文第一卷第八页存,末尾有《重修顺天府义学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藏抄本。一函六册,半页9行,字略大,文字讹误较多,还有内容倒错之处。正文第一卷第八页存,末尾有《重修顺天府义学记》。

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两函十册,为涵芬楼旧藏,字迹精致工整似刻本,文字亦有讹误。凡例之后有《修志姓氏》,正文第一卷第八页存。

### 2. 整理校勘

在查找对比过程中,我们发现刻本的漫漶不清之处基本相同,只是程度有所差别,推测应当是雕版本身损坏导致;而抄本大多在相同位置有空缺或错讹。

经过详细对比,可以看出南京图书馆藏刻本优于其他已见刻本。第一,其字迹清晰度高于其他已见刻本,许多漫漶不清之处可以辨识。第二,其凡例后多出一页与前文内容连贯,文末有落款,后面还有《修志姓氏》,由此可以推断此刻本的凡例部分才是完整的,而国家图书馆和中科院图书馆藏的刻本凡例部分应当是缺了此页。第三,其正文第一卷亦完整不缺页。

南京图书馆藏刻本第二卷中虽无《特设满洲儒学碑记》,但页码连贯不缺页,可知此刻本应是本身就没有此文,并非后来脱漏。此刻本末尾无《重修顺天府义学记》,且版式与国家图书馆藏刻本有细微差别,我们据此推测此刻本极大可能为康熙年间原刻本,并且部件完整。国家图书馆藏刻本虽然凡例和正文第一卷各缺一页,但内容多于南京图书馆藏刻本,且末尾有《重修顺天府义学记》,应为乾隆年间增补刻本。中

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刻本的凡例、目录部分排列顺序与前两种刻本相反。

综上,最终我们确定以这三处所藏刻本为主要参校本,对大兴区史志办公室藏抄本进行整理校勘,并将其定名为《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抄本中凡有与上述三个藏本差异者,均予以校订,并逐一出校注文字。此次整理出版,考虑到版面问题,需对每页所排校注文字字数进行控制,将三家藏本称谓进行了简化,国家图书馆藏本简称为“国图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简称为“科图本”,南京图书馆藏本简称为“南图本”。校注文字均以红色文字套印在每页天头处,以便于读者查阅参考。

## 《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 价值及亮点

在整理校勘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兴区史志办公室收藏的旧抄本《大兴县志》颇有版本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如《帝京图略》部分的图注文字,除刻本原有内容之外,还有一部分手写内容,应为抄者所补;正文第一卷第八页,除南京图书馆藏刻本外,目前已见刻本均缺,但此抄本中有;第一卷第十七页上“女儿节”之下,有双行25个小字,目前已见刻本及抄本均无,应是抄录或组织抄录之人所加的注释性文字。此外,抄本之中多处文字与刻本文字有异,我们经查找其他文献再三核正,发现是在抄录过程中对原刻本错讹之处进行了校订。这样的文字虽然不多,但也可以看出组织抄录之人当时也做了不少文字校订工作,弥足珍贵。

整理校勘现存地方文献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目前常见的古籍整理出版方式一为影印,一为点校。《大兴县志》的相关出版物很少,有代表性的为2002年上海书店等影印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⑦·康熙大兴县志》以及2002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罗保平等点校的《大兴县志》两种,即分别采用了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清钞大兴县志校订本》以宣纸线装原大影印保存版本之原貌,将校勘文字附在天头处,体现古籍整理之价值,使得此书既保存了古籍原貌,又体现出古籍整理的价值,这在现有出版物中实属罕见。

# 缩微技术在抗战文献抢救保护中的应用

## 兼以《东南日报》为例

□何隼 张超亚(国家图书馆)

抗战文献指的是反映中国在抗战时期各方面信息内容的文献资料,是民国时期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类文献。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自1985年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包括抗战文献在内的民国时期文献系统性抢救保护工作,并在各个发展阶段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抗战文献《东南日报》的抢救保护,在文献的自身价值和抢救方式上,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此外,缩微中心还进一步通过阅读服务、影印出版、数字化等手段对抗战文献进行深度揭示与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愿景与展望。

### 缩微中心对抗战文献抢救保护情况

长期以来,缩微中心十分重视抗战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截至2019年底,共组织各成员馆抢救保护抗战时期文献86326种,其中图书73552种,还有期刊、报纸,充分展现了缩微技术在保存保护文献上的实力。

**策略规划:**民国时期文献纸张酸度较高,文献易脆性较强且易发黄,而缩微技术作为文献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经过百年实践检验,具有稳定性好、安全性强和保存时间长(500年以上)等优点,是行之有效的文献抢救方法。缩微技术长于收藏,而数字文献长于使用,但由于数字技术更迭发展速度较快,技术稳定性不足,一直以来无法解决文献长期保存的问题,所以缩微胶片是目前全世界所公认的在收藏方面最为理想的文献载体。

缩微中心1985年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关于各馆馆藏文献情况的专题普查,尤其是包括抗战文献在内的民国时期文献馆藏的摸底和整理,并组织成员馆开展民国时期报纸的抢救工作。在1987—1991年古籍文献、资料抢救工作的五年规划中,将民国时期报纸和期刊纳入重点拍摄抢救范围。90年代以后,抢救重点逐渐转向期刊。2001年,以文献抢救为目的,以加强民国时期图书资源的建设和开发利用为出发点,缩微中心启动民国时期图书调查计划,组织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20余家公共图书馆对馆藏民国时期图书进行全面摸查,共调研民国时期图书书目数据45万余条,为各馆建立民国时期图书书目数据库奠定了坚实基础。同年,启动民国时期图书的整理拍摄工作。

**工作实施:**自民国时期文献抢救工作启动以来,缩微中心坚持创新思路,突出重点。1987年,缩微中心重点完成了1937—1945年间235种抗战时期报纸的缩微抢救工作。又历经10年努力,完成新中国成立前报纸620余种、期刊6700余种的拍摄,大批珍贵抗战时期报刊得到了及时抢救。近年来,缩微中心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中持续发力,共补缺民国时期报纸1180种224万余版,期刊数千种近2万期,极大提高了各馆馆藏文献的质量和史料价值。截至2019年底,缩微中心共组织拍摄民国时期图书127328种1432万拍,报纸2100余种920余万拍,已基本实现缩微技术对民国时期文献抢救保护的全覆盖。

### 《东南日报》的抢救保护工作

在缩微中心的统筹计划下,由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合作抢救的抗战文献《东南日报》,无论在文献的文献价值,还是抢救方式上,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文献价值:**《东南日报》的前身是1927年3月创办的《杭州民国日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浙江省机关报。1934年,报社改组为《东南日报》,报纸销量由三四千份激增至4万份以上,一跃成为全国第四大报。抗战爆发后,作为战争的记录者,《东南日报》旗帜鲜明、始终如一地宣传抗战,成为战时东南地区的新闻堡垒。每逢重大事件,报社不惜代价,特派记者深入一线报道,从卢沟桥事变一直贯穿至抗战胜利,编发了大批极具分量的战地通讯特写。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报社经历了多次搬迁,陆续迁往金华、丽水、南平等地,社员伤亡惨重,资金几乎枯竭。社员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不断自我重建,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份坚持在战争前线出版发行的大报。

此外,中国共产党秘密派遣多名地下工作者进入该报工作,抢占舆论阵地,积极宣传抗日和人民民主思想,报道了大量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新闻。如1937年9月11日《朱德、彭德怀就任八路总副指挥,改编已竣,东进杀敌,誓灭日寇收复失地》,并刊登社论称,“此一以擅长游击战略著称于世之生力军,将有如何惊人之功绩表现于后乎?吾人拭目以俟之”。地下工作者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共产党的主张和事迹通过国民党的报纸传递到人民群众中,尤其增强了青年学生对于共产主义的向往。

**协作方式:**受战时环境和保存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图书馆所藏《东南日报》均不完整,只有整合资源统一开展工作,才能实现最优抢救效果。缩微中心将该报纳入1987—1991年的五年抢救规划中,并统筹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根据各自馆藏和拍摄情况提交计划,由中心计划人员依据各馆书目数据进行比对和计划协调,确定该报藏量最大的上海图书馆和藏有《杭州民国日报》的浙江图书馆为拍摄馆,并以书目数据形式将拍摄计划下达至成员馆进行拍摄。

**工作实施:**1988年,在缩微中心的统筹安排下,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将所藏《东南日报》提取至上海图书馆进行拍摄。该报自1934年6月16日至1949年4月30日期间的杭州版、金华版、南平版和上海版,为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

辞书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四馆资源互补,丽水版和云和版为上海图书馆自藏资源,浙江图书馆负责拍摄本馆所藏《杭州民国日报》,就此构成《东南日报》的全部内容。《东南日报》的拍摄是缩微中心抢救民国时期文献的一个典型缩影,既是缩微中心抢救保护民国时期文献的重要举措,也是馆际合作的一次生动实践。

**成果利用:**目前,《东南日报》已在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阅览室提供特种文献阅览,总计76卷2216米44417拍,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辞书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四馆资源互补的杭州版、金华版、南平版和上海版,共计57卷1669米33961拍,上海图书馆自藏的丽水版和云和版共计19卷547米10456拍。

### 缩微中心揭示利用抗战文献情况

抗战文献的揭示利用主要体现在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两方面,在通过缩微技术对文献实现异质保存后,缩微中心还进一步通过提供阅读服务、影印出版、数字化等手段对抗战文献进行揭示与利用。

**再生性保护与利用:**缩微文献在再生性保护与利用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缩微文献自身具备服务能力,能够完全替代纸质文献为读者提供服务,避免原始文献的损害;其二,缩微文献能够有力提供服务保障,利用缩微与数字资源相互转换,可以实现文献长期保存与获得便捷的双向互补,在有效提升已抢救文献利用率的同时,避免了对原始文献二次扫描所构成的损耗,在业界已获得广泛认可。

**影印出版:**影印出版是指采用按原本制版复制的办法影印文献典籍并进行整理开发。缩微中心依托所藏民国时期文献资源,自1986年起开始启动影印出版工作,联合全国30多家公共图书馆,利用已抢救拍摄的缩微胶卷,编纂影印出版书籍300余种,其中抗战主题出版项目有《抗日战争期刊汇编》《抗战时期敌伪经济情报》《抗战时期中国国史史料汇编》等数十种出版项目,充分释放了抗战文献的史料价值和社会效益,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

**数字化服务:**缩微品数字化工作是将馆藏文献拍摄为缩微品后再经过扫描、接收、图像处理、格式转换、数据目次标引、元数据制作等步骤将其转换为数字影像,用于长期保存及网络发布。缩微中心自1999年起逐步开展民国时期文献缩微品数字化转换工作,截至2019年底,已

完成民国时期图书缩微数字化98644种104275册,共计18914040页,期刊缩微品数字化5393种5454237页,报纸缩微胶片数字化203种157062期约80万页,有效提高了文献利用率。

### 发展前景与工作规划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缩微中心将充分结合资源统筹能力、政策指引方向等因素,在扎实调研文献资源的基础上,坚持以项目工程为抓手,以馆际合作为保障,对包括抗战文献在内的民国时期文献进行深入揭示与开发。

**强化调研,挖掘素材:**针对当前民国时期文献抢救保护工作的动态趋势,缩微中心将继续夯实调研基础,强化相关资源挖掘的源头性力量建设,锤炼文献挖掘能力的精准化、深层化、专业化。在抗战文献方面,持续挖掘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日伪沦陷区等文献资源,从时间、地域、类别等多个维度,勾勒战时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轮廓,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贡献力量。

**依托民保,策划选题:**近年来,缩微技术在民国时期文献开发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应进一步依托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等工程,策划一批以抗战文献为主题的开发项目,持续拓展缩微文献在数字化服务、影印出版等馆藏文献再生利用方面的作用价值,不断提升抗战文献的服务效能,实现抗战文献资源的互通共享,为有关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有力支撑。

**深入内容,研发产品:**在充分掌握馆藏文献资源情况的基础上,缩微中心将进一步深入文献内容,在传统文献调研、文献提供与文献开发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基于新技术、新业态、新需求的“缩微+”产品,实现文献资源与信息科技、人文创意等要素的深度融合,派生研发以抗战内容为专题的相关产品,不断扩大缩微技术的利用范围,拓展文献资源的服务方向,实现对不同用户群体差异化文献需求的分层服务。

**推进协作,共同开发:**作为全国公共图书馆文献缩微工作的协调统筹单位,缩微中心应进一步提高统筹能力,从机制上推动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为各方搭建资源获取和发布的平台路径,建立统筹建设与自主建设并重的合作框架,并在原有馆际合作平台的基础上,推动各成员馆间文献资源的优势互补,进而多层次、深领域、全方位提高文献应用的效率水平,推动缩微文献开发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 《(民国)浙江续通志稿》正式推出

**本报讯** 作为“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重要成果的《(民国)浙江续通志稿》(全52册)日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

《(民国)浙江续通志稿》自1914年由浙江省通志局开始编纂,嘉兴沈曾植任总纂,专门筹建编纂班子,钱塘吴庆坻任总阅,秀水金蓉镜为纂修,永嘉徐定超为提调,并于各县设采访若干人,专事采集资料。这部方志的编纂还集合了朱祖谋、章梠、王国维、朱福清、陶葆廉、刘承幹等知名

浙籍学者。编纂工作至1924年基本废止,后来数百册清稿与征访稿散落各地,几经流转,大部分资料藏于浙江图书馆,部分散见于上海图书馆、嘉兴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地。志稿在纲目上虽沿用清雍正《浙江通志》体例,设疆域、建置、山川、形胜、城池、学校、公署等门,又富有时代特色,新增地方自治、海防、谘议局等门类,记述了清乾隆元年(173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间浙江省事,涵盖浙江地方研究的方方面面,所编志

稿学术价值极高,实属研究近代浙江的第一手资料,是反映近代浙江风土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更是传承浙江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要范本。

2012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自2013年起面向全国组织申报民国时期文献出版项目,浙江图书馆申报的《浙江续通志稿》整理出版”是首批获得保护计划立项资助的项目之一。  
林萱



立足于“全”,以“真”为要

## 《徐悲鸿全集》首次全面展现一代巨匠艺术世界

**本报讯** 5月20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徐悲鸿全集》出版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之子徐庆平,中国青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皮钧,中国青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常委、总编辑陈章乐,中国青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编辑李师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戴士和,《美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尚辉等嘉宾,以及中国青年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央美术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编辑《徐悲鸿全集》的专家学者出席本次活动。高洪主持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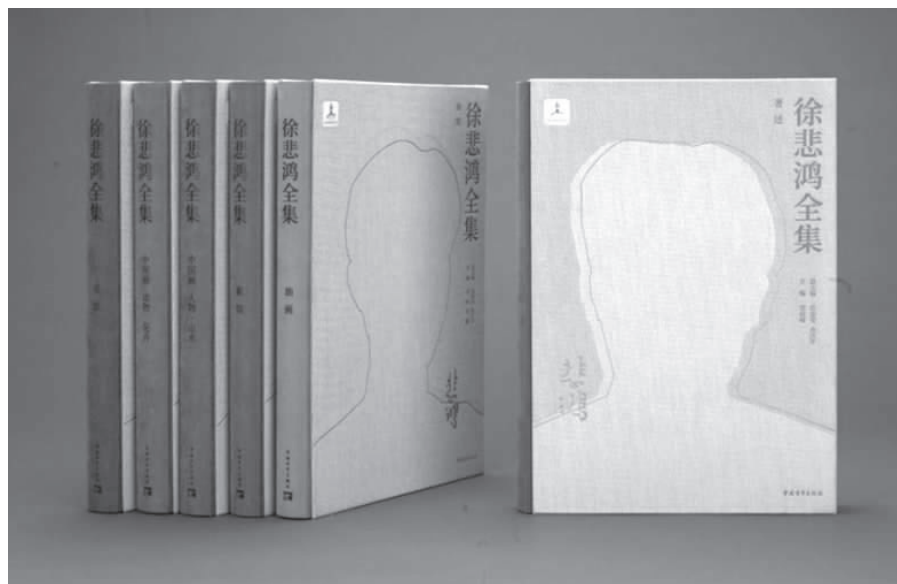
此次出版的《徐悲鸿全集》,由范迪安、徐庆平担纲总主编。作为国内外第一部徐悲鸿艺术的全集,入编作品以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以及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高等院校等公立机构所藏作品为主体,并甄选部分私人收藏作品编纂而成。全集由六卷组成,第一卷为油画,第二卷为素描,第三卷为中国画——人物·山水,第四卷为中国画——动物·花卉,第五卷为书法,第六卷为著述。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者,是杰出的艺术家、教育家和收藏家。早年,他在艺术创作上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入者融之”的改革理念。留学欧洲的经历,促使徐悲鸿进一步主张用西方写实主义绘画来改造中国传统绘画,走出了中国美术的现实主义道路。他的美术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造诣,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他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发现并团结了众多的美术界著名人士,培养了一大批美术人才,为新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 and 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高洪表示,徐悲鸿的名字与中国美术

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紧密相连,也与中央美术学院紧密相连。回望这所百年美术学院的发展历程,中央美术学院始终传承老院长徐悲鸿先生倡导构建的“整理、批判、承继我国祖先遗产,以及吸收世界遗产,以创造出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新中国美术”这样一种美术教育体系。《徐悲鸿全集》的出版,仿佛让我们重新回到徐悲鸿所处的那个对中国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时代,这对于我们在迎接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我校老教授回信精神,发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优良传统,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中国美术事业和美术教育事业的崇高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范迪安在致辞中表示,《徐悲鸿全集》的出版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件大事。徐悲鸿先生在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上付出巨大心力,作出伟大成就,是美术界几代人的先贤与楷模。范迪安总结了《徐悲鸿全集》的三个特点:一是立足于“全”。《徐悲鸿全集》首次以六卷合集体例来反映徐悲鸿的艺术创作,收录了大量徐悲鸿未曾公开的作品。全集分为油画、素描、中国画、书法、著述几方面,在结构上做到了“全”,全面展示了徐悲鸿的艺术成就,充分反映了徐悲鸿的艺术才华和贡献。二是立足于“精”。体现在全集作品选择之精,以真为要;精心编排,庄重大方,观感与徐悲鸿的气质相匹配;体现了校勘之精、注录之精,严谨细致。三是立足于“研”,全集汇集了徐悲鸿的学术成果,是徐悲鸿研究的集大成。全集邀请了多位专家学者,既有宏观概括,又有精微分析。范迪安认为,《徐悲鸿全集》的出版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进一步认识徐悲鸿在20世纪中国美术历程中的奠基和开拓意义,他坚定现实主义艺术思想的实践,他学习西方立足中国的艺术探索与创造,尤其是他为美术教育事业付出的毕生精力,都使今天的美术事业发



展和美术教育事业有源可依;二是进一步认识徐悲鸿的艺术思想与文化抱负的重要价值,他是一位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光明和进步的艺术大家,更是一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一生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三是对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如何弘扬传统、立足时代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邬书林从出版工作者的角度总结了全集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出版工作的社会功能就是传播知识、传承文明、推动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在文化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名著与中国传统重要典籍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十三五”规划以来,文化出版的重要工作就是做好现当代大家作品的整理出版,才能为进一步创新提供很好的基础。如果没有把世界上的好东西出版出来,不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研究清楚,供人民阅读,是不可能进一步的创新的。习近平总书记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强调,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像《徐悲鸿全集》这样的精品图书的出版,为今后文化艺术创新作了很好的铺垫,为更好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

“创新”奠定了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对推动更多年轻人在前人基础上发展创新将起到引领作用。

徐庆平谈到,一个画家去世六十多年后,还能够得到人们如此的喜爱,而且将他的作品给予如此细致的整理与推广,出版这么精美的全集,是对一个人民艺术家最大的尊重和爱护。他讲述了父亲徐悲鸿的生活日常、艺术创作特点等方面的生动故事。他还表示,徐悲鸿在书法上下的功夫,不比绘画少,此次全集特别收录了徐悲鸿的书法,是第一次对徐悲鸿书法艺术的全面展示。

皮钧介绍了全集的出版情况。他谈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徐悲鸿全集》,向徐悲鸿先生的经典作品致敬,以恭敬之心探索艺术殿堂。希望后人能传承并发扬徐悲鸿先生的优秀品质,肩负起当今时代赋予的责任,为推动文化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尽力。未来,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将利用其伦敦分社的国际平台,翻译出版该书的英文数字版,随“中国艺术在线——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数据库”进入全球大、中型图书馆和教育机构,从而促进国际读者对中国艺术的了解和研究。  
金晶

## 梅冷生先生抗战时期抢救温州重要典籍事例

□卢礼阳(温州市图书馆)

梅冷生(1895—1976)是温州市图书馆的老馆长。梅先生平生以继承永嘉学派的优良传统为己任,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倾注全力于地方文化建设,在诗词创作、方志整理,尤其是乡邦文献(包括文物)的征集保存方面劳苦功高,贡献卓越。梅先生1941年2月起主持籀园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前身),直至1976年7月辞世,任期长达三十五年,兢兢业业,有口皆碑。抗战时期,温州三度沦陷,为避免日寇轰炸或抢掠,梅先生冒险组织馆员,先后三次把馆藏珍本图书迁移到城郊与乡村,不避艰险,精心守护,从而保全了这处珍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依据当时的报道、档案、知情人的回忆与相关文献,仔细梳理三次抢运图书的前后经过,并试图展现梅冷生的心路历程。

## 梅冷生其人

晚近温州文化圈流传“事必言籀,言必怀梅”一语,所谓“籀”,即指籀园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前身),而“梅”,则为本文的主角梅冷生先生。

梅冷生名雨清,浙江永嘉城区(今温州市鹿城区)人。浙南图书馆事业的杰出代表,现代知名的诗人。

梅先生民国初年就读于私立东瓯政法学校。1920年创办《瓯海潮》周报,发起组织慎社、瓯社。1921年为省议会第三届议员。1935年4月,任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委员、总务兼印行股主任。1936年11月起,任陕西省财政厅秘书、浙江省政府会计处秘书等职。1941年2月任日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馆长,并兼日温属联立中学等校国文教师。1949年以后,籀园图书馆更名为温州市立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他继续主持馆务,直至去世。50年代初兼任市文管会主任、副主任。民革成员。晚年主编《馆藏古书目录》十册;长期留意本地遗闻轶事,陆续辑录《温州地区地方资料汇编》。“文革”期间中凤卧榻十载。有《劲风阁遗稿》行世,后增补为《梅冷生集》,收入《温州文献丛书》第四辑。

梅先生主持图书馆之前就关注乡邦文献的安危。1917年夏,存放《永嘉诗人祠堂丛刻》版片的瓯海关监督署,进驻一支部队,士兵打算把丛刻版片作为柴烧。先生闻讯后,即挺身而出,与驻军交涉,连夜移藏于籀公祠内。

梅先生1941年2月起接任籀园图书馆馆长,时值抗战高峰,为避免日寇轰炸或抢掠,他先后三次把善本图书迁移到乡村。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土改,文物图籍多被弃毁,又是梅先生主动向军管会负责人反映情况,请求政府给予重视。地委当即转令各地土改队暂加保管,再交由市图书馆集中接收。先生为此披星戴月,足足忙碌好几个月,抢救出民间藏书数万册,大大丰富了馆藏古籍的品种与数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温州市政协机关瘫痪,文史资料工作被迫搁置多年。兼任市政协文史工作组副组长的梅先生,将市政协征集到的未刊文史稿(231篇)及时转移到市图书馆收藏,妥善保存,得以躲过一劫。饮水思源,这不能不归功于梅先生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过人胆识和牺牲精神。

## 三度抢运始末

抗战时期,温州城区三次沦陷,为躲避日寇轰炸与掠夺,梅先生任内的籀园图书馆先后将藏书转移至永嘉郭溪、瞿溪、霞坊,瑞安仙岩、大罾等地保存。

1941年4月19日至5月2日,温州第一次沦陷。

此前未雨绸缪,已抢运一部分寄存近郊,另外一部分来不及转移出去的图书,则伪装起来放在籀园谷仓之内。

《旧温属联立籀园图书馆》一文谈及此次图书转移:“在四月间浙东事变后,经短时间之董理,即于五月十五日起照常开放,善本书籍及公私版片,早运山乡保藏。此次县城沦陷前夕,复抢运写本本乡先哲遗书及新旧重要书籍五千余册,寄存近郭农家,幸免于劫。”(《浙江图书馆通讯》第一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版)

所谓山乡、近郭,即指瞿溪。抢运数量,“早运山乡保藏”的数量未详,寄存近郭即达5000余册,而“写本本乡先哲遗书”,想必包括永嘉区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移交的那批抄本。

老馆友潘国存先生回忆:“是年4月19日,日寇侵犯温州,温州突然沦陷。先生在仓皇中将籀园部分古籍,伪装藏在籀园谷仓内,并将老工友王永福老母的木床横堵通道,终于避过日寇之劫难。”(《梅冷生集》前言,见潘国存编《梅冷生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1942年7月11日至8月25日,温州第二次沦陷。

据馆藏档案记载,此前1942年5月,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拟重印发行《永嘉县志》与《瓯海轶闻》,籀园图书馆呈请专员公署派人,将避日机轰炸而运度永嘉县郭溪区天源乡周岙村的两书版片,运回温州。(温州市图书馆建馆七十周年纪念集《七十春秋录》,1989年10月铅印本)

潘国存先生回忆:“第二年七月,温州城区第二次沦陷敌手,当战乱乌云笼罩全城,百姓纷纷避难,而先生冒生命危险,不辞困苦,将籀园藏的善本、珍本、乡贤批本、乡先哲遗著等都捆扎装箱,连夜运至郊外霞坊,分藏在亲戚家阁楼,免遭浩劫。”(《梅冷生集》前言)霞坊,村名,位于温州郊区。

日寇离温之后,梅冷生前往霞坊搬书,约好友夏承焘同行。见夏承焘日记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条:“冷生邀往霞坊搬籀园书,自茶院寺雇舟先过南湖,看杨家祠堂,冷生约同来此避乱。午到霞坊,饭叶范卿家,五年不见,老态龙钟矣。四时载书到籀园。”

1944年9月9日至1945年6月17日,温州第三次沦陷。

梅先生与馆友连榭带箱把善本珍本图书一万两千余册抢运至瑞安仙岩(今属瓯海区),稍后再转移至瑞安大罾镇龙川村(今属文成县),平装书和普通书则留在城内。当时第八区专员公署曾经拨款给予支持。

潘国存先生说:“一九四四年秋,日寇第三次侵犯温州城区,情势万分危急,先生雇人将馆藏古籍善本、珍本、精刊本,以及乾隆年代刻的丛书、精装的大学用书、外国出版的《韦氏大辞典》,计万二千余册,连同书柜书箱,抢运至仙岩寺院。而侵占城区的

日寇,蠢蠢欲动,有向瑞安侵犯之势,先生在百忙中,趁着黑夜,将这批国家文物沿水道先运至文成出口,再抢运到大罾龙川,安放在文昌阁楼,并派馆员前往留守。直至1945年夏天,日寇撤退,这批古籍文物才从龙川运回温州,一本无损。在抗战时期,先生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付出不少心血,功不可没。”(《梅冷生集》前言)

这次第一站为什么选择仙岩呢?

梅先生的曾孙梅海《“微阳温落叶”——试补曾祖冷生先生微阳诗》分析,一是地理位置,二是与仙岩寺当家和尚有交谊:

“曾祖父为何会把图书馆的古籍运往仙岩呢?虽然仙岩的地理位置比较偏,但毕竟在温州和瑞安中间,属于鱼米水乡富裕地带,与潘桥三溪一带相比,安全性明显不如。曾祖是有名的温州地理通,他岂能不知这点?带着这个疑惑,我又翻开《梅冷生集》,书中附录了一出家人写给曾祖的一通信札,信中探讨永嘉大师典故及重建净光塔因缘。这位出家人法名觉澄,温州人,广州六榕寺的方丈,亲炙过当代大德虚云长老,也曾任仙岩圣寿寺住持。……父亲说曾祖的确与仙岩寺一位和尚关系很好,这位和尚还教曾祖打坐,只是曾祖当时家事琐碎,一直没有静下来。我想应该是这个因缘,曾祖才想到仙岩寺,想通过寺院的僻静来保护这笔文化财富。”(温州市图书馆编《籀园芳馨:温州图书馆百年馆庆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当时梅先生留在温州守护图书馆,而安排家人往潘桥、仙岩分头躲避,相隔几个月,这批珍贵古籍转移到龙川,一家人再随后会合。

前引梅海的文章介绍:“1944年正是抗战时期,当年国民政府军队豫湘桂千里溃败。9月9日,温州沦陷于日寇。之前城中百姓已经开始逃亡,我梅家亦与大众一起逃难。据我祖母(林文英)回忆,1944年逃难时,曾祖父要照顾图书馆古籍,没有和家人一起。而且事发突然,我祖父(梅之荣)刚好在外做生意,没有回家。她一个女子拉扯大伯(梅明杰)、二伯(梅余春)两个孩子往潘桥逃难。二伯当时才二三岁,需要大人背抱,结果祖母在码头把大伯弄丢了。大伯也只是个六七岁的孩子,就在码头上哭了起来,还好被后来的阿公(梅之芳)一家捡到,阿公带着我大伯随图书馆同事先往瑞安仙岩逃难。几个月后,我们一家人才在瑞安龙川团聚。大伯曾告诉我,当时逃难,大家躲在船舱里害怕日本人飞机机枪扫射不敢露头,他口渴难忍,也不敢在河里舀水喝。那时在船上‘生尿配饼干’的滋味令他一生难忘。”(《籀园芳馨:温州图书馆百年馆庆文集》)

这里所说“图书馆同事”,就是前面提到的老馆员潘国存先生(1923—2011),笔名耒野,乐清人,温州中学毕业,经业师、原永嘉区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委员高性朴的介



绍,1942年1月进入籀园图书馆工作。

梅先生作为籀园图书馆馆长,他以为在战火纷扰之中保存温州文脉责无旁贷,因此在日寇入侵的危难时刻,决意将馆藏古籍转运仙岩圣寿禅寺(始建于宋朝至道年间)寄存。以后随着局势的恶化,这批藏书转到更为偏僻也更为安全的大罾镇,先乘船沿云江运到出口,再雇人挑担搬运至龙川村,寄存于文昌阁内。当年大罾一带有七八座祠堂,文昌阁位于半山腰,位置高,便于藏书。委托潘国存先生专门留下看护,并向当地村民开放阅览。梅先生则在永嘉瞿溪一家中学兼课,将教书所得寄给潘国存作为伙食费。据老辈说,梅先生不会说官话,他去中学兼课,是勉为其难。

当时浙江第三临时中学也迁到大罾山区办学。浙江省政府一度从云和搬到那里。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潘先生晚年回忆:“当时日伪奸县长吴江冷要派其妻任馆长,开放籀园。先生闻讯,忧心忡忡,如果在敌伪时期开放,图书损失是不可收拾的。于是他通过人正告吴江冷不要这样做,并晓以大义,叫他保护籀园。”(潘国存:《梅冷生先生与温州地方文献》,《温州文史资料》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从夏承焘日记看,吴江冷担任的伪职并非永嘉“县长”,而是永嘉县“救济院”院长。此事发生在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之间。

吴江冷为何会打图书馆的主意?有历史渊源。一者他以前做过教师、县教育局局长,与梅冷生、夏承焘有交往,还是好友,二者他妹妹吴莲影,系籀园老馆员,1927年至1929年供职,对情况比较了解。

## 省政府专函慰问

因梅冷生在抗战期间果断转移珍贵图书的壮举,1945年2月16日,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以永嘉、乐清两县避难乡间人士“乔松坚干,忠贞足式”,以省政府名义专函慰问,飭交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转发。其中“永嘉梅雨清、王永安、张景飞、夏耀禅、池仲霖、乐清黄式苏等六人,避寇经时,盖藏易竭,由省各致馈法币壹万元,并函慰问”。同年3月5日,浙江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就此发布训令。

1945年6月17日日军退出温州,经仙岩而龙川的这批古籍完整无缺运回温州城区,籀园图书馆很快于7月15日恢复开放。